

敬畏历史
留住记忆

文化之美

在活态传承中保护和利用



文水钹子

文水钹子流传于山西省中部文水及其周边地区,是一种古老而独特的民间音乐艺术,因表演中使用一种当地人俗称钹子的特制打击乐器——铜质小钹而得名,又因起源于文水县凤城镇岳村,当地民众习惯上称之为岳村钹子。岳村钹子具有浓郁的黄土风情,其风格豪放雄

浑、粗犷奔放、古朴厚重,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祭祀祈雨文化的缩影,传承着华夏农耕文化的精髓。

文水钹子使用的乐器有小钹、大钹、大铙、大鼓,因其乐器的不同组合、独特的敲击方法和演奏姿势等呈现出独特的音响效果。经挖掘整理,如今的文水钹子共有四个乐

章和其相应的阵形。分别为《电闪雷鸣》《乌云翻滚》《普降甘露》《喜庆丰收》。寓意深刻,可自成一派,亦可融合贯通,一气呵成,气势磅礴。

文水钹子多次参加全国性的比赛,频获殊荣,成为名符其实的锣鼓精品,被誉为“三晋锣鼓中的一绝”、山西省锣鼓四大精品之一。

临县伞头秧歌

根据民间传说和民俗活动,人们分析,伞头秧歌起源于古代北方民间祭祀活动,是向神灵祈福逐邪,保佑五谷丰登,旨在“娱神”的歌舞演出活动。经过岁月的磨砺,其宗

旨已由原来纯粹是为了“娱神”而演变为主要是“娱人”。成为春节期间农民自娱自乐的一种民间艺术活动。因在演出活动中由手执“花伞”者领头舞蹈和演唱秧歌,故称临县

伞头秧歌。其主要流行在黄河流域的晋西黄土高原,具体包括临县、柳林、方山、离石等地,其中尤为临县最盛。而当地人则习惯称临县伞头秧歌为“闹秧歌”和“闹会子”。

孝义皮影戏

孝义皮影戏是我国皮影戏的重要支派,因流行于孝义市而得名。据历史记载,孝义皮影戏在宋金时代已有班规、雕簇者存在,说明孝义皮影在宋金时代已发展成熟。据专家考证,孝义皮影起于战国,是我国最早的皮影发源地之一。皮腔是皮影戏曲的曲调,因皮腔音乐以喷呐为主要伴奏乐器,故又称“孝义吹腔”。孝义吹腔是中国最早的民间吹腔之一。孝义皮影以麻纸糊窗做屏幕,凭借悬吊在纸窗后的麻油灯亮影,因

此亦称“灯影儿”、“纸窗子”。一般纸窗面积为1.75m×1.21m。纸窗糊制有严格的裁纸、毛边、对口、粘结、平整等5道工序,其窗平整无皱雪白无暇。孝义皮影在明代之前以羊皮为雕刻材料,体高58~70cm,俗称“二尺影”。到清代,皮影体高缩至42~8cm,俗称“五尺影”,三岁牛皮为雕刻上等材料。孝义皮影造型粗犷、简练夸张,线条遒劲有力,极富韵味。明清时为孝义皮影的鼎盛期,孝义境内皮影班社多达70多家,随后逐

渐衰落。1957年成立孝义市木偶皮影艺术团,“文革”时期撤销。1978年恢复皮影戏演出,曾参加首届中国艺术节演出,赴英交流访问演出。1995年,孝义皮影中的武将形象作为邮票图案被全国人民认识。孝义皮影剧目丰富,现收藏有200余本,这些剧本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极具学术价值。对孝义皮影戏形成和发展的研究,有助于探讨中国戏曲的发生和演变的内在规律,了解皮腔原生态的唱腔结构。

离石弹唱

离石弹唱起源可上溯到宋代,据考,它是当时民间的一种说唱艺术。关于弹唱的起源,大体有二种说法:一是来源于寺庙音乐,二是来源于南方地方戏曲。目前较权威的说法是来源于宋代孔三传创立的说唱艺术——诸宫调。后受元代杂剧和明清小说的影响,逐步发展成一种集曲艺、小戏和表演唱为

一体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演唱形式。

在吕梁自古就有“东(汾阳)秧歌,西(临县)道情,小曲(弹唱)出在离石城”之说,离石弹唱主要发端于离石区,辐射到山川河流域的柳林、方山、中阳四个县。

离石弹唱对场地要求非常简单,农家小院、田间地头、开阔地都可以,一般乐队坐成一字或八字形,

演唱以对唱为主,兼有独唱、群唱,中间夹有少量道白,《申录》是最具代表性的弹唱曲目,有“九弯十八调之称”,同时“弯弯里面有套套,套套里面有调调”,曲调丰富、优美。曲目一般以民间传说、故事为蓝本,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情节完整,故事动人心弦,引人入胜,当地每遇婚丧嫁娶、节日庆典,必有离石弹唱。

S 言说文化

乡村振兴
与乡村振兴

编者按:文化不仅是国家治理的内容,更是国家治理的手段和方式。乡村振兴作为乡村全面振兴中的重要内容,起着为乡村振兴“铸魂”的作用。已经形成广泛共识的是,乡村振兴不仅是乡村振兴的任务和价值追求,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和抓手,为推进乡村组织振兴、生态振兴、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提供重要支撑。事实上,如何以乡村振兴带动乡村振兴,涉及繁荣乡村文化产业、提升乡村文化治理水平等诸多问题。

恢复乡村文化的生态均衡

乡村文化主体性不仅源于认知层面的文化自觉,而且依赖于农民日常生活的文化实践。村庄日常生活结构不仅定义了农民的文化实践逻辑,并且塑造了乡村文化的再生产模式。市场化的文化产业发展和行政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乡村文化的主体性危机。为此,乡村文化治理需要立足乡村社会基础,坚持农民主体,通过村庄动员和价值调控的方式激活和引导乡村文化再生产的内生动力,恢复乡村文化的生态均衡。

(杜鹏)

创新乡村文化治理

新时代乡村文化治理亟需安排一个创新机制,以勾连三大纵横治理逻辑,破解乡村文化治理的悬浮化困境。控制权共享制可以作为勾连三大纵横治理逻辑的创新机制。首先,控制权共享制,是由乡镇政府让渡部分乡村文化控制权给文化能人、新乡贤等控制权代理人,由乡镇政府与控制权代理人共享乡村文化控制权力的创新机制;第二,控制权共享制产生的根源是乡村文化治理的扁平化结构,其形成了“乡镇政府+控制权代理人”的形式,纵向沟通行政发包制、项目制和乡村社会的联系,横向连接各类功能性组织以形成乡村文化治理分类控制体系;第三,可以从扩大共享深度、提高规范性两方面提出保障对策。

(廖青虎)

推进乡村文化现代化

振兴乡村文化离不开全社会的积极参与,但重要主体是农民,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不仅要体现农民主体地位,更要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要解决优秀乡村传统文化传承乏力、竞争力不足以及受关注度不够等现实难题,就需要:在主体维度合理调动内生动力和外在激励,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提升农民的文化发展能力;在客体维度积极消解传统与现代、经济与文化的矛盾冲突,推进乡村文化现代化;在载体维度尊重乡村与城市的差异,广泛开展农民文化活动,加大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支持力度。

(夏小华)

乡村文化生态的重建之道

在乡村文化生态的历史转型过程中,尽管历史趋势不可逆转,但乡土文化依然具有新的时代空间,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也亟待优化。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应寻求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与乡土文化的互补与创新,在外部生态支持系统的保障下,寻求重建乡村文化生态的融合发展之道。

(夏永江)

S 链接

乡村文化是传统文化生民的家园,是乡民在农业生产与生活中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道德情感、社会心理、风俗习惯、是非标准、行为方式、理想追求等,表现为民俗民风、物质生活与行动章法等,以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人们,反映了乡民的处事原则、人生理想以及对社会的认知模式等,是乡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民赖以生存的精神依托和意义所在。较之工业的高度发展,农业的缓慢发展常常给人以安全稳定的印象。相对于城市的浮躁、复杂与多变,乡村则有着更多诗意与温情,它承载着乡音、乡土、乡情以及古朴的生活、恒久的价值和传统。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乡村文化是与庙堂文化相对立的一种文化,乡村文化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人们的记忆中,乡村是安详稳定、恬淡自足的象征,故乡是人们魂牵梦绕的地方。回归乡里、落叶归根是人们的选择和期望。在现代社会,乡村文化依然是与城市工业文化相对立的一种文化,许多城里人生活在都市却处处以乡村为归依,有所谓“乡土中国”的心态。城镇化是“以城带镇”的发展模式,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的传统农业社会向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

文化旅游

刊头题字 贺前进

吕梁市文化和旅游局 主办

